

文史資料

10

重慶市
渝中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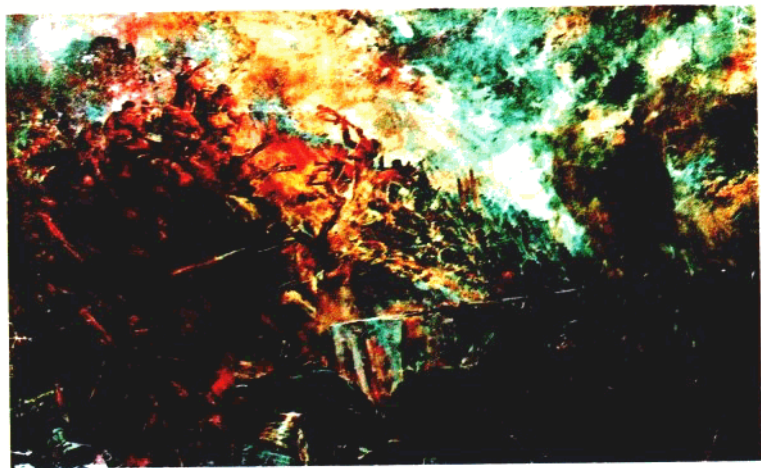
重慶市渝中區政協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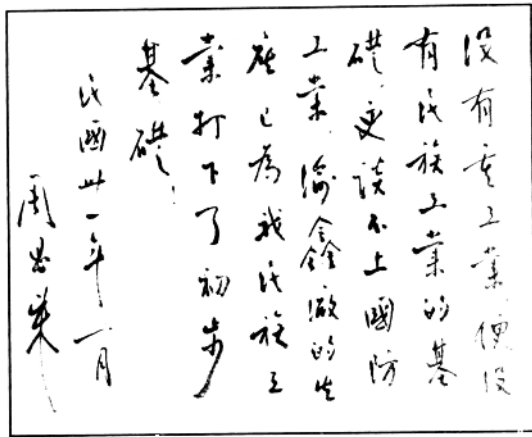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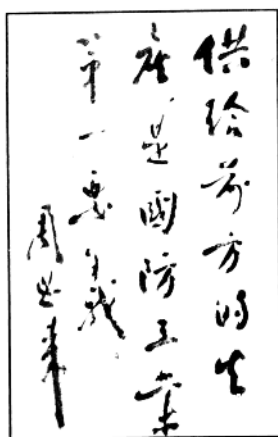
图① 1997年10月底，江泽民主席借访美之便，去美国费城看望了他在上海交大的老师顾毓秀教授，欢聚了40分钟。

顾教授系我1947年-1948年在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共事的老友。此像片系顾教授于1998年3月1日寄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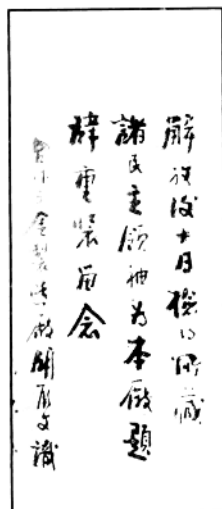
渝中区政协老委员薛祚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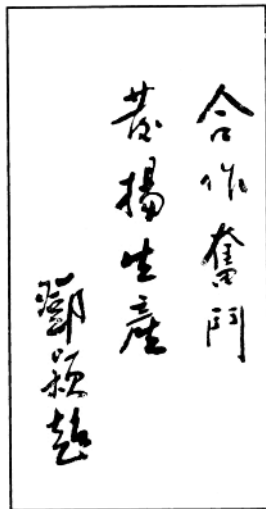
图②油画《上甘岭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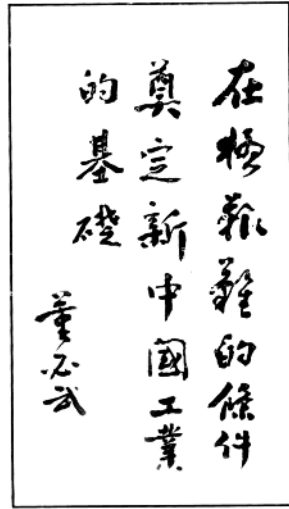
图③周恩来题词



图④周恩来题词



图⑤邓颖超题词



图⑥董必武题词

图⑦ 周总理（左二）与重庆市工商联负责人温少鹤（左一）、肖松立（左三）、徐崇林（右三）亲切交谈。



图⑧ 周总理与重庆市工商联温少鹤副主任委员亲切握手。



图⑨ 1957年2月10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光临重庆市工商联。图为工商联四届二次会议全体同仁热烈欢迎的场面。



图⑩ 峨嶺碑刻

《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

第十辑

目 录

一、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

1. 周恩来与新四军 周西平(1)
2. 周恩来与陪都戏剧文艺界的情结 唐维华(17)
3. 周恩来与重庆工商界二、三事 伍志安(24)
4. 周恩来情系陪都工商实业界人士 唐维华(29)
5.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薛祚光(37)

二、军政

1. 简述解放前党所领导的重庆城区“学运” 李世庆(39)
2. 参与重庆接管的历史回顾 徐众军(48)
3. 我所了解的渝中区解放初期人民政权
建设情况 程昌华(51)
4. 回忆解放初期的民主建政工作 曾慧生 武建政(56)
5. 重庆市第一区菜大地区减租退押
土改概况 邹用陆(61)

三、工商经济

1. 重庆工商界史话 伍志安(67)
2. 重庆文教纸张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回顾 向兴华 吴兴邦 严维华(81)
3. 抗美援朝时期重庆工商界献机回忆 陈天赐(88)

四、文化教育

1. 刘湘在渝二、三事 欧阳昭华(89)
2. 重庆的女子职业学校 欧阳昭华(90)
3. 解放前后巴蜀学校见闻 甘佩萱(96)
4. 重庆二中迁校追记 陈益民(113)

五、文学艺术

1. 追根溯源话峨岭 胡昌健(115)
2. 渝南旧事 寇思敬(117)
3. 陪都儿童生活报琐忆 陈东阜(120)
4. 忆二哥慧良成才之路 厉慧森(124)
5.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忆川剧表演艺术家姜尚峰…… 夏庭光 曾祥明(127)
6. 大型油画《上甘岭》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周祖铭(136)
7. 川剧知音任白戈 余荣邦 朱龙渊(144)

六、民族宗教

1. 重庆市渝中区的天主教堂 陈仲伦(155)

七、方志

1. 大都会广场追昔 彭伯通(158)

周恩来与新四军

周西平

为纪念新四军建军六十周年，追思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建立和成长所作的伟大贡献，特撰写此文。并以此表达对这位伟人所寄予的无限哀思。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上海、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被迫接受国共联合抗战。经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斗争，最后，国共两党取得一致意见，同意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将南方八省红色游击队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新编第四军——即以后通称的新四军。在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和领导下，新四军在进行抗日和反摩擦的斗争中胜利发展壮大。在新四军组建发展壮大的历程中，作为党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表现出了他对人民事业的赤胆忠心和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

现在就以下一些问题来概述周恩来在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一些情况。

一、关于新四军的组建

遵照中共中央“必须不断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的指示，经过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面、公开谈判与斗争，终于使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色游击队编为抗日的人民军队。对于军长的人选是经过曲折斗争的。蒋介石原来打算把这支红色游击队编为他的建制部队，企图以他的忠实人员陈诚来担任军长。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明确地反

对的。周恩来同志则费了很大的心血，作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由叶挺同志担任。直接提出又怕蒋介石拒绝，考虑到叶挺同志和蒋介石亲信将领陈诚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私交也比较深。于是示意安排由叶挺找陈诚表示他愿意负责领导这支军队。叶挺是北伐名将，在全国都是久负盛誉的。蒋介石也知道叶挺在广州起义后离开共产党在欧洲十年，早已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经陈诚推荐之后，蒋介石就表示同意。当然叶挺同志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心愿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了解。所以经过周恩来同志提出以后得到国共双方同意。

叶挺同志从陆军小学、中学到保定军校，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革命，后到苏联入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到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深造，他的军事素养是很高的。1925年1月在苏联经陈乔年主持、王若飞、聂荣臻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多年学习马列主义、追求革命真理的心愿。同年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经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和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谈话后，安排在当时党领导的34团——即后来的叶挺独立团当团长。这支共产党人组成的独立团就是在北伐军中屡建奇功的铁军，其战功和声威震动北伐军。

新四军组建期间，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各方面的阻、压、卡。首先，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配备的一批主要领导骨干如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先是拒绝，后是拖延不予任命。其次对初建新四军所需的基本经费，当时列支的基本预算为十六万余元，也是拒不拨付。当叶挺对蒋介石直接提出：“如果不给经费，那我这个军长就无法当了。”蒋介石才慌了，就说：“军长还是要当的，经费问题找陈诚、何应钦再商量”，最后他们只批了六万元，后经过周恩来再次交涉，最终增加到九万元，军服也卡住不发，还借故拖延，新四军初

建,成员都是由各个山头下来集中的游击队员,由于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衣服非常破烂,叶挺提出应拨发的被子、衣服也未同意满足,只批了一万套,这当然是不够分配的。

对武器、弹药则根本不发。当周恩来、叶挺向蒋介石提出,抗日起码要有武器弹药,蒋介石也只是嗯嗯不作具体回答。当时蒋介石的侍卫军官说:“你们可以向日本人那里去夺嘛!”后来蒋介石又推到新四军的辖区军事当局去解决。周恩来同志经过不断地交涉、谈判,在给毛主席的汇报中说:“蒋介石对新四军的人、钱、物都是卡得极紧的。”至于新四军的集结地点,也是经过反复交涉谈判的。蒋介石一直把新四军的活动地区,都是限制在他的武装力量控制的范围中,使新四军活动在比较狭窄的地区。随即国民党制定“限共”、“防共”的方针,还诬蔑我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袭击友军”是“奸军”、“新军阀”、“变相割据”等等,而且还经常扣发我军军饷及军用物资,想方设法限制作战区域和军队编制,甚至封锁、包围,阴谋企图加以消灭。

为了贯彻党中央对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限制,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和斗争。

新四军的组建及东进抗日,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双重领导,当决定河南竹沟新四军四支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后,周请调彭雪枫由晋来豫,成立长江黄河间一军分区,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彭负责。周恩来指示在豫南、豫东作大量的组织发展、干部培训,动员群众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在新四军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以后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都是在这里打下最初的基础,然后开赴敌后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对这一部分工作的指导、指示都是正确的。

二、关心新四军的团结和发展

新四军与八路军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叶挺同志从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党十年，在他担任新四军军长这个阶段，他不是共产党员，这在发挥他的职能方面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他与副军长兼政委和军党委书记项英同志关系上出现一些问题。

项英同志是工人出身，他是多年的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的监察委员，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南方各游击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成新四军，创建抗日根据地都作出过贡献。但他在对抗战这个新时期正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要团结尊敬叶挺同志，更好地发挥叶挺的军事才干”理解不足。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急需很好地贯彻，由于项英长期没有很好的按中央方针办事和叶、项在合作共事上的矛盾，中央派周恩来送叶挺到新四军赴任并督促贯彻六中全会的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在新四军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在仔细地听取了广大干部的汇报和调查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新四军今后的发展方向，明确三句话——即十四个字，“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向北发展，就是抽调部队过江，在江北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主要向上海、南京等地区。巩固现有阵地，就是对现有的阵地茅山等地要不断地巩固发展，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对全局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新四军的这个发展方针，完全符合六中全会和毛泽东同志的要求，得到许多新四军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都积极执行了这个方针。

对新四军发展的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三条，哪个地方空

虚，我们就到哪里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当时如果始终坚持这些原则和方针，新四军的发展将会更快。

抗日战争时期，环境非常复杂，在捷报频传时，新四军两个主要负责人出现了一些矛盾。1938年5月，毛主席给项英的电报中指出：“要始终保持同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这话的意思是十分深刻的。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多次说过：新四军军事指挥应交叶挺来办。这些问题要在新四军中进行正式教育，以确定叶挺对新四军的正确关系。并讲：对叶挺工作问题的解决，将影响新四军的前途，全国同情对我们的态度关系也是很大的。项英要注意同叶挺的关系。

当1939年周恩来同叶挺在武汉谈到新四军工作的情况时，当时叶挺脸色都变了说：“我名义上是军长，难办呀，我有职无权呀！”又说：“我想了很久，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新四军的工作可以开展得更好。”周了解到此情况后，向中央发电报：“叶挺建议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建议由项英作主任，叶挺作副主任。”党中央、毛主席同意叶挺这个建议，并任命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项英在皖南也收到中央的复电。叶挺很高兴，认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将解决了。他说：“周公就是那样的了解人，帮助人，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可是项英对叶挺的建议有些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后来，叶挺发电报给周恩来提出离开新四军，周收到电报后，同王明、博古一起，坚决挽留叶挺。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去延安开会去了，周恩来回叶挺电：“项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

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况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望勿误。我们深知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叶挺向当时的战区长官请假去湖南、江西观察各方面的情况,这样就离开了新四军到南方去了。

项英希望另外的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他提出:目前新四军的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这说明他希望另外的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意见,同叶剑英同志商量,新四军应当保持我党的领导,不能改变现在的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过,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

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叶挺回部工作是有利的,新四军军长的职务,国共双方都很关心,国民党方面引起很大的反响,蒋介石多次对中共有关人士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派更难与中共相处的军长,另外是把新四军改为游击队,减少军事拨款,如果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利了。1939年10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新四军问题的原则是,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由叶挺为正职,项英为副职,项仍作政委,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且进一步提出:“应尊重叶挺的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英多注意军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中央书记处还委托周恩来到新四军去一次,处理新四军的有关问题。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曾对叶挺作过工作,并对叶挺说:“你来了就好,你还愿意回新四军吗?”叶挺略一思考说:“我愿意回新四

军工作。”之后，周对叶又多次进行交谈，作工作。并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留叶在华中的决定。叶挺说：“我自己是非党员，工作困难，大家信任我，如加入了党，这只有往八路军去，如在新四军，蒋介石是会怀疑我的。”叶挺流露出与项英相处的难处。周恩来体谅叶挺的难处，接着说：“经请示，党中央已经同意新四军委员会由你任正职，项英任副职。以后新四军的军事工作多交给你办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深深地感动了叶挺，叶挺再次表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2月18日，周恩来同叶挺从重庆乘飞机到桂林后，坐火车从湖南经江西到新四军军部，陈毅知道周、叶要来，就同项英一起迎接，粟裕也来欢迎。

在新四军军部，周恩来看到军部会议室只挂了马恩的像，没有挂孙中山的像，他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应将孙中山先生的像挂出来，他又看到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文件，其中还反映了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内容。他慎重地指出说：你们不挂孙中山的像，看来很左，但是又一切服从国民党，甚至还用蒋介石的讲话作教材，岂不是很右嘛！你们必须以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准则，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

一天，叶挺、项英为欢迎周恩来，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请，新四军军部的主要干部都出席了。入席时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项分座两旁，叶挺站起来举起杯说：“我和项英同志欢迎周恩来同志来指导工作。”周恩来站起来一边道谢，一边同叶挺、项英碰杯，同时示意袁国平、周子昆要他们向叶挺敬酒，袁、周以及粟裕同志在北伐时都是叶挺的部下。陈毅同志在追赶上南昌起义部队后，也到原来的独立团（七十三团）任过指导员。他们都很尊敬地称叶军长是他们过去的老领导。

不久，周恩来向新四军的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好领导如果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呀？！”项英沉默地不说什么，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项英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你想过吗？叶挺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项英才作自我批评说：“我要同叶挺同志搞好团结。”

周恩来还同陈毅作了长谈，“你们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中全会精神的。”

关于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还广泛地听取了各支队领导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知道了许多新情况，作了许多树立叶挺威信的工作，但是项英心中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工作处境也没有很好的改善，后来周恩来同志见到袁国平时再一次叮嘱：“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以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可以批评项英的错误嘛！”

周恩来到皖南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帮助新四军解决发展方向问题，新四军东进一年多，虽然创造了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但从全面看，新四军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统治活动区域，实际被限制，地域很小，横宽纵深仅几十公里，处于这样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解决新四军发展方向刻不容缓。延安的毛泽东，皖南的周恩来、陈毅、叶挺、项英和新四军的每个指战员，都在思考这个严峻的问题，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共分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二、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三、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讲话指出：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行新的施政纲

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下，愈能够显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周恩来在会上响亮指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

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已批准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应利用此机会作发展的布置。在武装力量方面，华北准备在适当时机转移一部到华中，在军、政、党、民的干部补充上，中央正计划从陕北调一批到华中，东南局及新四军应决心调一批营以上军政干部到江北，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指示特别提出新四军在江南尚有万余人，而发展又受很大限制，许多大员仅指挥数千人，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

193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致电毛主席、项英，指出：“国民党内外落后和顽固势力仍占上风，对我党我军关系估计只有日益变坏”，“江南新四军目前处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的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电报最后提出了新四军主力和指挥

机关分批转移到江北津浦铁路以东的五条建议。

三、围绕“皖南事变”同国民党展开的斗争

在抗日民族大义的前题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要防左，又要防投降主义右的错误，还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在国统区是直接与蒋介石集团终日打交道的。对新四军的问题与国民党蒋介石作直接正面斗争的就是周恩来同志。蒋介石过去的反共历史那是昭昭在目的，从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对八路军、新四军就想消灭、削弱。特别是对新四军从开始组建、集结地区、活动范围、粮饷、武器弹药、医药和医用设备、被服和活动经费，都是极尽刁难，与其他抗日武装，都不是同待遇的。与国民党直系则更是差远了。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削弱，甚至想假手日寇、伪军消灭我军，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一直是代表党中央与之进行正面交涉、谈判、斗争的。但也最深切了解蒋介石这个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所以在谈判、交涉、斗争中他是时刻警惕蒋介石的阴谋。他的这种卓越的政治智慧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是一致的，所以在这方面深得毛泽东同志的赞许。

在“皖南事变”前，他对蒋介石的阴谋伎俩多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反映过，而新四军的实际负责人项英同志长期在思想上犯右倾错误，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强调精兵主义，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不认真接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指示意见，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新四军在中央指示北移时，项英则以各种借口理由，迟疑犹豫，丧失了转移的最好时机，当事态发展严重，中央严辞责备督促时，项英仍心存犹豫、动摇。在被迫行进时又处置失当。“皖南